

论读书与书目

郑伟章

说起读书，近来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对于引导广大读者为四化勤奋读书，刻苦钻研，起了很大作用。世界上的书笈浩如烟海，人的生命、精力极为有限，读书如何读法？特别是青年人学习欲望强烈，初涉学海，便有个从何下手、何处投足的问题。人们如何根据自己的喜爱、特点和专业选择书笈来读，这需要有良师益友加以指导，这良师益友就是“书目”，人人都可以找到。

古人把书目视为学问之门径，书海之舟楫，最为重视书目对指导读书的重要作用了。

唐代毋廑在《群书四部录序》里说，从三代到唐朝，书笈就已经“开凿遂多”，汗牛充栋，举毕生之精力，不可读其万一。如果没有书目“剖判条源，甄明科部”，人们读书就会象“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海，倚杖追日”那样困难，就会“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笈，遂终年而空泯。”但是，如果有书目指导人们读书，就可按类索书，寻根究源，“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可见，书目不但能指导人们大量阅读与自己有关的书，而且还能够指导人们“尽探精术”、“咸识睿思”，深刻领会图书的内容实质。书目对于读书来说，实在是不可缺少的老师。

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总是乱读。”“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他所说的目录即是书目，“目录之学”，恐怕也并非后世的所谓“目录学”，因古代并无专门的“目录学”，而只有大量的书

目。所谓“目录之学”，就是学会使用书目。只有学会使用书目，才能“目录明”，不明，就是乱读书，读书再多，用处也不会很大。所以，他认为治书目是“学中第一紧要事”，是“读书最切要者”。这是古代学者的真知灼见，应为我们深深记取。

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里，有一段“论读书宜有门径”的文字，专门论述了书目就是读书的门径和良师。他说：“汎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严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他把书目当作指导读书的良师，通向学术宫殿的门径，有了这位“良师”的指导，才不至“误用聪明”，得此“门径”而入，就能“事半功倍”。

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说：“目录书者，所以告学者以读书之方，省其探讨之劳也。”

“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之学，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他在《论学杂著》一书中，结合自己读书生活的亲身经历说：“嘉锡束发受书，先君子自课之。常坐之案头，口授章句，五经、楚辞、文选，既卒业，即命观四史、通鉴，学为古诗文，不令习时艺也。嘉锡颇知嗜学，发篋中书尽读之，目为之眚。小子狂简，遂裴然有述作之志。年十四，作《孔子弟子年表》，读

《郁离子》，好之，效其体著书数万言。十六岁注《吴越春秋》。然于学问之事实未有所解。阅张之洞《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问之所从入。及读其《輶轩语》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闻诸先君子，为道其所以然，意欣然响往之，遂日求购读。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十有七矣，先君子以事于长沙，始为购得之，则大喜，穷日夜读之不厌。”论读书，余先生幼年即窥经史，论才华，余先生少年即有述作，尚且有“不知学问之所从入”之感，更何论他人？直到他读了《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目，方得学术之门，终身勤奋精研，终于成为我国近代的一位学术大师。可见，书目确实是一位指导人们读书的良师啊。

由于书目对读书有如此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它都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我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具有高度重视书目工作的悠久传统，他们不但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化古籍，而且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的书目财富。远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于石渠、天禄阁之上，条其篇目，撮其旨要，录而奏之，以成我国第一部正式的书目《七略》、《别录》。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将《七略》、《别录》“删其要”以备篇笈，即是今天我们见到的重要文献《汉书·艺文志》。班固开其先河，自此而后，历代撰史者或撰地方志者必撰艺文志或经笈志。往后，我国的各种书目便层出不穷，不可胜数。私人书目最著名的有阮孝绪《七录》、王俭《今书七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艺文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笈考》等。国家书目最著名的有唐代毋煊、韦述等撰《群书四部录》、

宋代欧阳修、王尧臣等撰《崇文总目》、清代乾隆皇帝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此外，还有大量的佛、道书目，各种专科书目，此不备举。

到了近、现代，许多学者就更为重视为读者开列读书书目了。张之洞因当时许多青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撰成《书目答问》，指导青年阅读古籍。这本书目虽然是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但对人们阅读古籍，研究古学，至今不失其参考价值，所以它一直受到学术界和青年们的重视。鲁迅曾经向青年推荐过这部书目，他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一九三一年范希增又对它进行增补，撰成《书目答问补正》。资产阶级学者胡适、梁启超也均为青年撰写过读书书目，不过，他们在当时是想通过开书目的形式，把青年引向书本，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去皓首穷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书目对指导读书的作用，不可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鲁迅先生也很重视开书目，《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附录二》就有一篇《开给许世英的书单》，是鲁迅给许寿裳先生的儿子许世英开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参考书目。他在这篇书目中，还特地开列了一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指出：“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笈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一九二六年夏，鲁迅从日本朋友那里获得两个涉及中国小说史的书目：《内阁文库书目》、《也是园书目》等，他如获至宝，就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他说：“此虽止简目，当亦为留心小说史者所乐闻也，因借《语丝》以传同好。”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也极为重视书目对读书的重要指导作用。他亲自为尼·亚·鲁巴金编撰的书目《书林概述》写书评，指出作者编制书目是“开始了一件极有价值的工

作，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开展起来，并且向纵深方面发展。”他曾在—项苏维埃的法令里写到：要“开办目录研究所和讲习班，建立目录图书馆，出版关于目录问题的书笈和杂志”等，可见他何等重视书目工作啊！今天，我们翻开《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我们还能看到，列宁亲自动手为我们撰写过一篇很长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专题《参考书目》。他在这篇书目里，详细开列了三类著作，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和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著作；一类是根本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一类是修正主义者的著作。列宁开书目并不是纯而又纯，而是让读者从正反两方面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书目对读书有如此重要的指导作用呢？首先在于一部好的书目实际上就是一部学术史。清代学者章学诚最主张书目应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辨章学术”，就是要从内容上辨别—书的学术流派，所谓“考镜源流”，就是要弄清某—学术流派的历史渊源及—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我国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和《汉书·艺文志》以来的优秀古典书目都具备这个优点。比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小学类，在开列了西汉以前关于文字学的著作共十二种之后，还有一段文字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了文字的产生、文字学的发展过程及每一种著作的产生情况和学术价值。读完这样的书目，对于搞文字学的人或喜爱文字学的青年来说，不但掌握了秦汉以前系统的文字学的书目，而且懂得了文字学的学术史知识。余嘉锡说：“目录即学术史也”，郭沫若说：“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其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的一斑。”（见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光明日报》）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书，开篇就是“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他多是取材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目。可见这样的书目确实是价值极高的学术史。我们读书之先，如果读了这样的书目，就不但掌握了某—学科的书目，还懂得了它的学术发展史，这样就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就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否则，就必然“总是乱读”

“汎滥无归，终身无得。”其次，—部好的书目还告诉读者如何选择书来读，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什么书该精读，什么书该汎读？什么书有哪些家的注释，何家注释为优，何家注释为劣？某—书应该如何读法，记取什么，摒弃什么？有的书目还介绍作者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历史上对该人该书的评价，等等。读了这样的书目，不仅使人心灵开窍，而且又省多少探讨之劳！再其次，—部好的书目还告诉读者，—书有些什么版本，什么版本为优，什么版本为劣？某—版本出版者是谁，出版地何处？或被收集在什么丛书之中，如何找到这本书？比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以此而见长，对指引读者找书来说十分方便，免走弯路。这些都是前人读书所留下来的经验，我们步此捷径，何乐而不为？

综上所述，读书是离不开书目的。读书，跟在海洋上航行—样，必须有灯塔、舵手和指南针。在大海上航行，如果没有灯塔、舵手和指南针，就会莽莽撞撞，或遇暗流，或触礁石，有葬身海底之险；就会茫茫然不知所向，碌碌飘盪，永远达不到自己想要达到的彼岸；就会望洋兴叹，甚至却步回首，根本不敢下海。同样，要想驾驭书海，也必须有灯塔、舵手和指南针，这就是书目！凡善治学之士，必善治所学之书目，先知书目，求其书而读之，循序而渐进，方能事半功倍。

当前，四个现代化的脚步声动地而来，全国人民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的空气蔚然成风，人民的学习愿望是空前强烈的。由

于我国经济和教育事业还很落后,在校教育还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大学生、研究生只占青年中的一小部分,多数青年和其他群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自学。如何指导这些读者自学呢?这是一件大事。当然,报刊上经常发表书评和读书心得体会是必要的,但经常发表各种专题书目,对指导读书更是十分重要的。大学教授带研究生,并非天天手把手地教,而是给学生定下研究课题之后,就给学生开列一大堆书目,由他们自己根据这个书目去找资料,去自学、研究、写论文。我想,如果这个老教授的书目单子能拿出来发表,也供那些没有读研究生的机会的青年自学,他不是可以带出成百上千的研究生吗?其贡献不是大得多吗?给读者开书目并非易事,必须是深通学术的人方足与此。章

学诚在《校仇通义》里说:“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余嘉锡说:书目工作“非博通古今,明于著作之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办”。我国的一些优秀古典书目就都出自硕士鸿儒之手,只有象他们博通群书,深明道术,才能真正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为读者开书目。现在,我国许多老教授、老专家辛勤钻研一辈子,各自在自己的专业范围里博大精深,但都已到烈士暮年,应该将他们的知识财富尽量多地留给后人,其中,将他们的研究、摸索了一辈子学术所得的书目留下,乃是一笔极宝贵的财富啊!因此,出版社和刊物经常为读者发表或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书目,很有必要。

从《全国报刊索引》分类表的修订谈 图书和资料分类法“三性”的辩证关系

黄恩祝 李光达

为了使《全国报刊索引》能更好地为四化服务。上海馆索引组对索引的分类法进行了修订,在修订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没有革命就没有科学,分类法应以思想性为主;思想性可以代替科学性和实用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分类法的‘三性’不能彼此代替,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时代中‘三性’的关系可能而且应该是辩证的关系而不是主次的关系”。我们是持第二种观点的。我们认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比较集中反映我国解放后关于如何编制社会主义时代的分类法的许多争论的要害,因此开展这方面的争论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在,我们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点探讨性的意见,供大家讨论参考。本文分三个方面论述。

五十年代苏联图书馆界在大争论中建立了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性的分类法,但作为社会主义时代分类法的“三性”关系应如何从理论上阐述,从实践中解决却没有做到。

五十年代末苏联图书馆界曾爆发了一次关于分类体系的论争,这个争论是围绕列宁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的基本序列进行的,中心问题是分类法该不该把马列主义排在基本序列之首,论争双方的基本论据是:

同意的一派认为:马列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既是社会